

“野生作家”和他们的文学栖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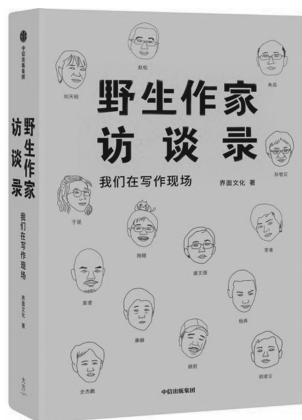
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享有专业作家的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他们更像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来养活自己,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的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默默地持续写作这件事。

这是《野生作家访谈录》一书的前言中对“野生作家”的定义。时下,国内越来越多野生作家在文学圈名声渐起,这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展现了中国文坛另类、多元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他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也许从《野生作家访谈录》采访的14位作家身上,我们能略见一斑。

现代快报+记者 姜斯佳



《野生作家访谈录》
界面文化 著
中信出版集团

“野蛮生长”，各有各的栖息地

“野生作家”标签下,这些写作者们有着各异的知识背景与职业选择,除了写作之外,他们彼此之间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

赵松另一个更世俗的身份——上海证大喜玛拉雅中心的办公室主任,负责人事和行政,日常工作就是写公文和报告,忙碌且琐碎。刘天昭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曾经是《南方都市报》社论主笔,是那种说起履历有很多人会羡慕的“才女”。杨典的父亲是原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教授,母亲是小说家,从小家里来往的都是艺术家,在这样的氛围里,杨典从来没有想过除了文艺,这个世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做。康赫则自称:“论‘野生’,我应该毫无悬念第一。”一方面,他曾尝试过许多职业——国企员工、家庭教师、地理杂志编辑、日报记者、时尚杂志作者、美食杂志出版人等等;另一方面,他写小说、排戏、拍摄影像、从事声音实践。

之所以说他们“野生”,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偏离人生正常航道、驶入社会主流之外的经历。他们先是走上了主流之路,在经历失败失望之后,又在旁人不解的目光中重新开辟了一条小径,从“脱轨”逐渐到“野生”,恣意生长。

社论写得风生水起之时,刘天昭选择了辞职去国外读书,因为很难再从工作中找到乐趣。“我想藏起来。我想跳下这动荡繁华的时代列车。我怀疑自己投入社会生活之初,就是为了否定它,为了安心地离开它。”同样在媒体行业发展顺利的袁凌也对现实有着类似的感受。从《新京报》到《财经》,再到新浪,从普通记者做到管理层,做记者表面上满足了袁凌对接触现实生活的渴望,但他心里隐约感到不安:“人家生活了好久,你去写一个稿子就走了,好像很生动,能叫生动吗?人家生活了一辈子,

你写了五天,能叫深度报道吗?”他觉得自己欠缺了生活的真正经验,最终选择回归乡村,记录行将消失的乡土。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完全“脱轨”,而不得不过上“双轨”生活。为了打破麻木的日常,赵松也曾尝试过开书店,后来又南下上海。结果兜兜转转,绕了一圈,孩子和房子让他又转回了写公文的老本行。但房子也不是唯一让赵松无法下决心进行全职写作的因素——他衡量过这样做的代价,得出的结论是,现行稿费条件下,如果要保证现在的生活,“我会把自己写死。如果我的书也能卖到十万册,我也愿意不上班慢慢写,但那是不太可能的,卡夫卡一辈子也是上班。”

身为SOHO(在家工作)族的于是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翻译与写作的收入并不够她的生活开支,她还得依靠给杂志写稿子过活:“我想写小说,而我所赖以生的可能都是没什么人看的稿件。”在《同居笔记》里,于是写道:“文字裂变成两种:一种是写‘我’的,一种只有‘我’的;一种为了生存,一种为了存在。前者是满登登的空虚,后者是压抑着找到出口的充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远离主流的道路上,互联网为野生作家们提供了很多助力。2000年之后互联网在中国兴起,论坛BBS出现,迅速打破了文学作品传统的发表和传播方式。刘天昭工作之余在罗永浩创立的博客网站“牛博网”上写博客,获得了不少关注,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因此找到了她,给她的博客出了一本书。独眼也是因为“水木清华BBS”一次偶然的讨论,才产生了连载小说的念头。

别出“新”裁,靠独立“觅食”成长起来

于是认为,“野生”的另一重含义是写作者不拥有所谓的家学传统或师承体系,写作者靠独立“觅食”成长起来,“东一口西

一口,像一个野生动物一样,你今天觉得想补充什么了,就逮着什么吃什么。”

对盛文强来说,滋养和哺育他文学创作的营养来源是海岛,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赋予了他经验、想象以及一种特有的“语言”。这种语言不限于文字,它可能是一个鸚鵡螺上复杂但有序的花纹,可能是梭鱼腹部银光闪闪的鳞片,还可能是岛民们围炉夜话或者母亲恐吓顽皮的孩子时从口中冒出的那一个个面目骇人的海怪。正如盛文强在《岛屿之书》的后记中所写:“记忆、语言、命名,所有这些力量都被召唤出来,为文本的生发提供了契机。”由此,他对志怪、传奇中的海怪进行再阐释,写出了既映射现实又奇诡异常的《海怪简史》,根据渔业传统创作了《渔具列传》,随后,《海盜奇譚》也应运而生。

孙智正的“缪斯”则是时间。在思索和对抗时间流逝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写法:“我应该把我想到的所有事情都全部复述一遍,这是非常漫长的一个镜头,大概长达四五年,中间是没有剪辑的,永远是平铺直叙,即使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能看得懂。”按照这个创作思路,孙智正写出了《青少年》。这篇流水账式的小说被好友张着评价为“烂到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如同每一个人的活着”。然而,张着同时也承认这是一种强大的写作,一种清醒下的理性思考。孙智正心心念念着永生,他认为到了未来,无论是换身体还是精神电子化,人类一定能实现永生。“我跟柏拉图是同时代人,他是前一秒钟的人,我是这一秒钟的人。我们都是永生来临之前的一代人。”永生来临之前,他靠写作与时间抗衡。

不依靠师承或点拨,野生作家们以阅读实现自我的养成。赵松为他以读为师的历程标记了不同的阶段,小学老师是海明威,初中老师是博尔赫斯,高中老师是罗布-格里耶,他曾与里尔克神交,后来在惠特曼的作品中发现了文字呐喊的力量;袁凌如今以冷峻的非虚构写作闻名,阅读时对诗歌情有独钟,他读哈代和保尔·策兰,也喜欢陶渊明与孟浩然,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义为非虚构写作者或非虚构与虚构交叉地带的复合型写手;胡彦云的文学启蒙老师则是凡尔纳,“我一直觉得凡尔纳写的不是科幻,说探险类的都不是很准确,他写的就是正统的文学,只不过和科学有点关系”。

江湖之远,靠写作实现精神或物质独立

被问及“写作是否应该进入某个圈子”时,14位野生作家的意见空前接近。朱岳认为圈子容易让彼此太相似,从而展现出某种“家族相似性”;刘天昭表示“不知道有圈子的作家是怎么互相帮助的”;袁凌说圈子非常没有意思,与其有宁可没有,混圈子混出来的名声是腐朽的;顾前则温和一些,说圈子不是必要条件,有人有圈子也可能写得很差。与此感受形成呼应,盛文强概括入选野生作家系列的诸位共同点在于“精力没用在发表和跑奖,葆有文本的自觉,这样的人很稀少了。”

因为没有“发表”和“跑奖”,

很多野生作家都面临“出不了头”的风险——无法占据主流期刊、出版物以及大众视线的中心。面对这种边缘化的处境,赵松反而有一丝庆幸:“我觉得边缘是好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点击率至上的堕落时代,边缘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褒奖。”

身处江湖之远,野生作家们大多显得非常“佛系”。独眼一开始写小说甚至不是为了成为职业的小说家,她认为自己在做一种人工智能的工作,做一种模拟的体验:假如我是别人,我会怎么样?代入一种角色、一种身份、一种性别,去体验独特的个体在生活中会经历的情景,会碰到的障碍,渡得过的和渡不过的难关,爱得到的或爱不到的人,这是写小说带给她的乐趣。

在想当作家的童年时代,杨典曾跟父亲争执,父亲觉得艺术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杨典反驳说:“我的书现在没人看怕什么,就是500年以后才有人看也没关系,我的书是能够传世的。”现在,他觉得这些想法也很可笑:“传世很好,不传世也是正常的,都是小事,天地万物间,个人存在的性质和非洲原野上死了一头羚羊是差不多的。”

盛文强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做一个“野生”的专职写作者是比较容易的。倒退二三十年,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离开体制就无法生存。如今,只要自己有能力强,靠写作就能实现精神和物质的独立。如今,盛文强正过着双重边缘的写作生活:一方面,他不同于那些自费出书靠关系的写作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混主流作家圈子。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写作和考察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海洋知识体系,这个体系足以支撑他即使处于边缘状态,也能自给自足。

与此同时,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近年来,文学本身也几乎被“边缘化”了。对此,袁凌保持乐观的态度:“如果我们不那么计较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不那么计较高雅和通俗,我觉得文学的读者始终都在,只是说这些不同的形态之间需要对话,也需要对抗,我们也能从papi酱身上找到营养,网络语言里面也有好的东西,只是说你要跟它有张力。不是说几个传统文学圈的人就可以把持语言,那种语言往往也很腐朽。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重要,读者始终会有,你只要不是固步自封,不是守着几个经典不放,莎士比亚当时也是个戏子,只是后来被捧成经典,我觉得都没什么要紧,文学的读者始终会存在的。”

朱岳的表态,则有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意思。他曾经写过一份模拟的自我采访,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意外发现了古代海盜藏匿的宝藏,有了大笔金钱,你想为中国文学做什么?”他接着自问自答:“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作者们不必靠写作为生,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所以我会投资创办一个‘纯文学作者职业介绍所’,向他们介绍一些不是太忙、不用加班、不用担负太大责任的工作,工作地点最好在家附近,收入中等。我可能还会给聘用纯文学作者的企业一笔补贴,奖励他们为文学事业所做的贡献。”